

文學研究的挑戰

劉亮雅*

國科會人文處《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邀請我撰文討論如何兼顧學術發表的質與量，我想到的是文學研究充滿挑戰，不論是研究英美文學或臺灣文學，都是如此。以我為例，我有兩大主要研究對象：(1) 二十世紀英美小說；(2) 解嚴至今的臺灣小說。三十多年來，我從原本從事純文學研究，轉向女性主義與同志研究，再轉向後殖民研究，關注於文學中的性別、種族、族群、階級、性取向、文化與美學議題。隨著研究方法和研究議題的轉變，我擴大了關懷。穿梭於英美小說與臺灣小說的雙軌閱讀，讓我逐漸培養出比較文學的宏觀視野，體察文化差異與跨文化的翻譯、挪用和影響。我一方面追求研究的質與量，另一方面下意識地試圖將當代臺灣小說經典化，並從文學出發，努力擴展、深化有關臺灣文化的議題。以下是我對於促進學術發表質量的淺見。

一、著重細膩、扎實的文本分析

我的起點是二十世紀初英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即使在三十多年前，經典作家如喬伊斯 (James Joyce)、吳爾芙 (Virginia Woolf)、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都已累積大量的文學研究。這也不足為奇。正因為他們是經典作家，而能獲得更多研究者的青睞。或者反過來說，因為有大量的文學評論和研究，樹立了他們的經典地位。後學者要超越既有的研究，除了熟讀文學文本，經常採取兩種方式：一是以某種新的理論或議題切入，另一則是將之放在歷史脈絡研究加以分析。英美文學研究深受一九七〇年代以降一波波新的文學理論的衝擊，新理論也帶出新議題，然而新理論、新議題雖然打破了新批評 (New Criticism) 只重文學性的封閉性，細膩的文本分析依然是英美文學研究的基石。歷史脈絡式的分析則豐富了經典的歷史與文化意義，探討文學生產的文化政治。令人訝異的是，透過新理論、新議題或歷史脈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絡研究，或兩者的結合，確實讓英美現代主義經典被讀出源源不斷的新義，繼續生產精彩的論文。我也因此認為臺灣文學經典化必須奠基於細膩、有原創性和深度的文本分析。

二、探索新議題、擴展研究關懷

我的博士論文結合女性主義、同志論述和新歷史主義的脈絡式研究，探討英國現代主義作家勞倫斯 (D. H. Lawrence) 和吳爾芙、同期的女同作家霍爾 (Radclyffe Hall)，以及先於他們的維多利亞後期男同作家王爾德 (Oscar Wilde) 小說中的性／別政治，將之放在十九世紀性學、二十世紀女性投票權運動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脈絡。在博士論文後，¹ 我轉向美國黑人女性小說，尤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摩里森 (Toni Morrison)。我從中學到的是：歷經種族、性別、乃至階級等多重壓迫的黑人女性如何挑戰主流的刻板印象、呈現多元複雜的黑人女性主體，弱勢族群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學傳統、文學經典和文學批評，如何透過歷史小說來處理歷史創傷與歷史記憶，如何探討口述文化及其當代意義，如何強調黑人書寫的複雜性和文學性、提出新的美學等等。與此同時，我也研究了九〇年代臺灣的同志小說 (朱天文、紀大偉、洪凌、邱妙津、陳雪)、後現代小說 (平路)、女性小說 (李昂、朱天心、成英姝)。後來我逐漸轉向後殖民小說，包括處理二二八、白色恐怖、霧社事件議題的小說 (李昂、陳燁、舞鶴)、黨外運動或學運小說 (李昂、賴香吟)、原住民小說 (田雅各、巴代)、女性鄉土小說 (李昂、賴香吟、陳雪)、環保意識小說 (吳明益、甘耀明)、清治記憶小說 (施叔青、李昂)、日治記憶小說 (施叔青、李昂、吳明益、甘耀明、郭強生、巴代、陳玉慧)、荷治記憶小說 (巴代)。我探討的臺灣小說涵蓋四大族群作家，小說背景涵蓋臺灣四百年，彰顯臺灣文學是國家文學。許多我所研究的解嚴至今的臺灣小說，在我研究之時鮮少有人寫過研究論文；我經常是開創者。就如同我的博士論文需要研究歐陸和英國的性學、女性投票權運動和佛洛伊德，在研究臺灣同志小說時我也閱讀有關臺灣同志的田野研究，在研究臺灣後殖民小說時更廣泛涉獵有關臺灣史的文獻。

三、研讀新的文學理論

文學理論有助於以新穎的問題意識切入小說文本。當代的文學批評幾乎必

¹ 此處略去我在博士論文之前與之後所做的其他二十世紀英美小說的研究。

然受到新的文學理論的洗禮。研讀文學理論後，較容易對小說文本提出新的叩問。不論是否在論文中使用文學理論，文學理論所促發的批判意識都將滲透到文本分析裡。我並非做純理論研究的人，早先在文章中使用文學理論，通常是為了借助理論，以開啟某種思維或彰顯某個論點。但漸漸的，我在援用國內外後殖民、性別、現代性、全球化、翻譯、空間、左翼、精神分析等文化理論時，也試圖與之對話，並藉以深化對臺灣文學與文化政治的探討。我尤其努力將國外理論放在臺灣歷史脈絡裡重新思考，讓臺灣小說中的視野能與之對話、辯證。因此當我以「後現代與後殖民」的概念撰寫解嚴至兩千年的臺灣小說史時，我探討「後現代」與「後殖民」在臺灣如何被翻譯、使用或誤用，臺灣當時主導的文化思想、文學主題與美學手法上如何展現後現代與後殖民的並置、角力與混雜。我對一九九〇年代外文學門的後殖民與後現代（以酷兒為代表）大論戰的剖析，不但爬梳、評述每一位的論述，將之放入臺灣文化和社會運動脈絡，也與英美的後殖民、酷兒、女性主義理論、黑人論述做比較，以實踐比較文學的深刻思辯。² 薩依德（Edward Said）、福柯（Michel Foucault）、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德里克（Arif Dirlik）的理論讓我深受啟發。薩依德先是研究現代主義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知名學者，才變成後殖民大師。他的後殖民理論奠基於他受到福柯等理論家的影響、他對西方文學與非西方後殖民文學的深入研究、他對地緣政治的瞭解及他對新的文獻的大量閱讀。他的理論樹立了比較文學的典範。

四、閱讀新的文獻

在純文學研究的時期，歷史被視為是既定的、不太需要討論。做理論研究的人，除了後殖民理論與福柯，也鮮少關注歷史。然而在探討臺灣文學時，歷史其實是重要議題，因為戒嚴時期的教科書抹煞、扭曲了臺灣歷史。九〇年代當我最初開始撰寫有關臺灣小說的論文時，自以為非常瞭解臺灣，後來卻發現不論是探討二二八、白色恐怖、臺灣原住民議題，或是處理臺灣的日治記憶、清治記憶、荷治記憶等議題，我都必須從零開始。所幸解嚴後新的歷史研究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我透過廣泛閱讀而得以調整或修正自己的思考框架，也參考許多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和文化研究，而能找到新的問題點，並與小說所呈

² 我指的是歷經多次增修的〈臺灣理論與知識生產：以一九九〇年代臺灣後殖民與酷兒論述為分析對象〉的最後版本，收入《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202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現的視野相互辯證。例如我發覺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在日本統治結束超過半世紀之後，二十一世紀竟然有許多不同族群的臺灣小說家重返日治記憶，深入探索日治時期臺灣人的精神面貌。日治記憶儼然是當代臺灣文化的重要元素。但重返日治記憶的背後其實是關注臺灣後殖民，試圖重新銜接臺灣戰前與戰後。我因此提出臺灣與日本雙方實踐對日本去殖民的五大要素，並深入探討戰後到二十一世紀臺灣日治記憶小說與電影的發展史，也歸納出二十一世紀臺灣日治記憶小說與電影的六大特色。

五、結語

我追求研究的質與量，原本是基於學術訓練，設法符合自己心中的標竿。但我愈來愈意識到，當我對許多單一小說和作家做了深入研究，我就能反思、拓展有關臺灣文化的種種議題，也能對文學史和文化史提出新的問題和見解。當我將臺灣文學經典化，建制為國家文學，就能讓它放眼世界，被拿來與其他世界文學一起討論而毫不遜色。